

本刊特稿

《生产力研究》No.18.2007

汇率干预的联动效应及对我国汇制改革的启示

谢瑞平, 王艺明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文章结合美国和日本 1985 年以后汇率干预的历史, 分析了汇率干预政策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及联动效应, 能否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并在对美国和日本汇率干预政策的分析基础上探讨我国的汇制改革问题。

【关键词】 汇制改革; 汇率干预政策; 人民币

【中图分类号】 F83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768(2007)18-0001-03

2005 年 7 月 22 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 引起全球广泛关注, 这是我国政府逐步推进汇率改革的开端。该项改革的推进, 是我国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内外平衡、控制汇率风险的需要, 在权衡各项利弊得失基础上做出的决策。新汇率政策实施的直接效应之一是人民币升值, 意味着我国购买力水平的提高, 从总体上看, 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利大于弊。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汇率改革的推进过程中, 我国政府受到了来自国外政府, 特别是美国和日本政府的外部压力。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指出, 人民币升值面临的是投机压力。这种投机压力一方面是政治的, 另一方面是国际炒家的, 前者决定后者。对外经贸大学的丁志杰教授则指出, 目前中美最大的分歧在于, 中国的立场是自主实现弹性汇率机制的形成, 而对美国而言则希望我们尽快升值。

尽管近期有学者认为, 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有所缓解, 具体体现在, 八国峰会结束后发表的公报在论述全球贸易失衡问题时, 没有将人民币升值作为解决方案, 美国参议院一再推迟表决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法案等等, 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只是缓解, 而不是消除。应该指出, 全球贸易不会很快就趋于平衡, 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率与其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相关, 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 他们需要大量的进口产品, 贸易赤字将继续居高不下; 而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还会持续, 部分原料和能源的低价也可能维持, 在比较长的时期内, 出口产品的价格仍然会比较低, 中国对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贸易顺差的格局不会改变。这些国家的一部分人仍然会间歇性地就人民币问题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

因此结合各国经验, 探讨在国际压力或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改变汇率, 能否实现预定的经济目标, 最优的汇率政策如何实现等问题, 对于我国汇率改革的推进和汇率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旨在结合美国和日本 1985 年以后汇率干预的历史, 分析为何两国不通过国内制度来解决根本的经济问题(税制改革和金融改革), 而却偏好使用汇率政策? 这种汇率干预政策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是什么? 能否实现预期的政策目

标? 现有的汇率政策分析, 很少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国家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认为, 汇率政策的制定在考虑经济因素的同时, 还是国内政治行为者间协商的结果, 但是汇率政策的制定通常会影响到他国经济的波动, 只是国内政治行为者却很少考虑到汇率的国际连动性。本文将在对美日汇率干预政策进行分析基础上探讨我国的汇制改革问题。

一、1985 年美国的汇率干预政策

日本经济从 1960 年开始高速增长, 在 20 年间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 10%。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变: 在日本方面, 由于在美国刻意的保护政策下, 日本经济丝毫不受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 同时也成功地进行国内产业转型, 在对外贸易方面更是突破历年来顺差的最高点; 相反在美国方面, 却出现双赤字——贸易和财政赤字, 1984 年美国对外贸易赤字高达 1600 亿美元, 占当年 GDP 的 3.6%, 同时在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下出现庞大的财政赤字, 在双赤字的影响下, 美国政府提高国内基准利率以期引进国外资本, 却造成美元不断升值, 影响美国的出口竞争力, 在当时美国对外贸易最大的逆差国就是日本, 因此, 1985 年 9 月, 美国联合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介入, 签署了“广场协议”, 强烈要求日元升值, 以缩减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逆差。

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不断升值, 从 1985 年 1 美元兑换 236 日元至 1987 年日元升值了 100%, 在 1991 年更曾升值至 1 美元兑换 95 日元。在日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 带动日本国内基准利率的下跌, 使得国内游资突然暴增, 而这些国内资金再加上国际资金的注入, 大量投入房地产和股市中, 使日本国内房地产和股市价格不断飙涨, 企业再利用飙涨的房地产和股票, 向银行质押贷款再投入房地产和股市中, 在这种恶性循环下, 形成日本从 1986 年~1991 年著名的泡沫经济, 而日本政府在泡沫经济期间为了维持自民党政权的稳定, 竟然控制了大藏省辖下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 以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日本经济的繁荣。日本的泡沫经济在 1991 年破灭, 接着便进入了持续十余年的衰退期。

【收稿日期】 2006-0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CJY002); 中国立信风险管理研究院课题“开放经济条件下外汇储备风险研究”; 2005 年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科研资助计划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谢瑞平(1973-), 湖南资兴人, 经济学博士, 厦门大学财政系讲师, 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王艺明(1976-), 福建厦门人, 经济学博士, 厦门大学财政系副教授,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研究方向: 金融学、财政学与计量经济学。

由此可见,1985年后日元大幅升值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特别是美国的压力。1985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从1984年的1750亿膨胀到2050亿美元,累积贸易赤字1054亿美元,为1984年同期的两倍。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民间与政府竞争资金,从而促使利率水平大幅提高,最后导致景气大幅衰退,增长率从1984年的7.1%降为1985年的2.8%。两项赤字中财政赤字明显高于贸易赤字,因此美国政府应该缩减财政赤字以彻底解决美国经济问题,但美国政府却只针对贸易赤字而忽略财政赤字,这与美国政经体制在80年代中期的变化相关:首先,里根政府不愿增加税收和削减社会安全支出,而国防支出却大幅增加,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财政赤字已不可能,因此里根政府的政策目标从削减财政赤字,转向缩减贸易赤字以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率;其次,美国企业希望通过削减贸易赤字以提升其出口竞争力,反对通过增税以缩减财政赤字,因而促使国会制定并通过有浓厚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新贸易和关税法案;最后,美国人民将工作机会减少归咎于对外贸易和进口商品的冲击,主张限制进口以保障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鼓励政府对实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国家(日本)进行报复。

上述政治经济因素的合力,使美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应,开始以汇率政策的调整来缩减美日之间的巨额贸易赤字。这样不但有助于提升国内产业的出口竞争力,而且不必缩减财政赤字和增税,不会造成政府和国会间的政治纷争,这是最有利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

二、2001年日本的汇率干预政策

日本在经历十年的经济衰退后,从2001年开始,放弃过去长期使用的扩大政府支出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改为以调整日元汇率来提升出口竞争力,该项政策被认为是“以邻为壑”。采用这项政策时,主要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包括:国际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东南亚市场的经济衰退使日本出口市场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国内方面,日本人民在历经十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后,逐渐对政府的政策失去耐心,自民党政权必须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在经济政策工具中,日本政府已用尽所有的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产生效应较慢,因此小泉政府便在不顾邻国和美国反对的情况下,采取汇率政策以期实现经济复苏的目的。

2001年日元大幅贬值时,日本仍然是亚洲的主要贸易出超国,在最近十年的贸易出超总和高达1兆美元,其中对亚洲国家的出超约占一半,高达4624亿美元,在巨额贸易顺差的积累下,日本外汇储备高达3600亿美元,是欧洲18国的总和;另外,日本国内金融体系累积的不良债权逐渐扩大,政府负债规模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40%,可见日本这波经济不景气的根源并非汇率制度(币值被高估),而是日本国内崩溃的金融体系,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以国内经济复苏为名,干预汇率以使日元大幅贬值,显然存在一些非经济因素。

小泉政府之所以采取日元贬值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日本国内政经体制的变化。过去探讨日本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都认为在于政府的主导(自民党派阀)、全能的官僚体系和大企业的配合。但自从90年代日本历经选举制度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和行政改革后,日本政治体制产生了极大的转变,自民党派阀无法再继续控制所有政治资源,而国会的角色日渐重要,大企业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使得权力平衡关系逐渐从自民党派阀转移向大企业。2001年以前自民党之所以不采用汇率政策,表面上的原因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和邻国的反对,但实际仍是希望以财政政策来维护自民党的利益。但从2001年起,日本的对外贸易开始衰退,因此企业开始通过国会向政府

施压,希望改变过去的财政政策,通过调整汇率来刺激出口。在民众和国会的双重压力下,小泉政府为了要在短期内见到成效,便不顾国际压力以调整汇率来实现刺激经济的目的。

2001年日元的持续贬值,结果是造成亚洲周边国家出口竞争力受到严重打击及货币的竞相贬值,另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一触即发,而日本的经济似乎并没有因为日元贬值而有所起色,一直到2004年才有稍有复苏的迹象。

三、汇率干预政策的联动效应

根据国际金融理论,汇率的波动源于国际收支平衡和购买力的变动,汇率的调整必须根据一国的产业竞争力,来决定其币值是高估或是低估。但我们发现日元的升值和贬值却与市场无关,完全来自于国际压力(1985年)和政府干预(2001年):美国在国内企业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放弃缩减财政赤字,却通过日元升值来削减美日间贸易逆差;日本在大企业压力下,不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进行处理,却以日元贬值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这两次汇率干预的结果是,1985年广场协议所造成的日元急剧升值,美国经济并未因此获利,反而日本在其政府的政策调整下,形成80年代末期的泡沫经济,日本政府至今仍在收拾泡沫经济所遗留下来的大量不良债权;2001年日本政府的汇率干预,造成亚洲周边国家出口竞争力受到严重打击及货币的竞相贬值,另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一触即发,而日本的经济并未因日元贬值而有所起色。我们已分析了汇率干预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接下来我们要对汇率干预的连动性和政策后果进行经济分析。

(一) 经济危机下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

Peter Gourevitch(1986)指出,当国家面临国际经济危机的时候,会采取以下五种不同的经济策略:市场经济政策;计划经济;经济保护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和重商主义,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市场经济政策和刺激国内需求是各国最常采用的两种主要的经济策略,市场经济政策是指开放国内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刺激国内需求则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促进经济增长。

在日本和美国的例子中,我们发现两国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当面对过度支出所产生的财政危机和贸易赤字时,都不约而同地以调整汇率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以图1为例,当国家面对经济衰退时,可以通过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他国协商产生最优的汇率政策;另外,也可以通过国内政策调整,通过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实施来摆脱经济困境,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所产生汇率调整的效应,会影响到他国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日本和美国为何不论在国际压力或政治干预下,所实施的汇率调整却都无法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最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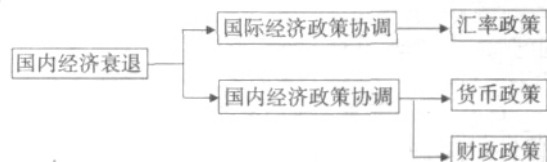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危机下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

(二) 汇率政策的国内连动性

当本币升值时,本国出口商品价格较他国昂贵,不利于国内的出口贸易,且此时国内基准利率上扬,吸引国外资金大量流入,若此时政府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经济,将会使国内游资增多形成泡沫经济;另外,当本币贬值时,出口商品较他国便宜,有助于提高国内贸易的出口竞争力,而此时由于

货币贬值会使国内利率下跌,因为国内利率较他国低,使国内资金大量流出,假如此时政府继续调低基准汇率,则本国经济会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中。

日本政府在1985年日元大幅升值后,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致日本陷入泡沫经济的泥沼,就是汇率传导性最好的例子。因此,汇率政策的应用必须要考虑到国际收支平衡和购买力平价,而汇率的调整必须根据一国的产业竞争力,来决定其币值高估或低估。汇率的调整必须完全由自由竞争的市场供需所决定,而不是由政治因素来决定,美国政府过去对汇率政策进行过度干预,以致造成目前日本国内金融体系巨额的不良债权,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三) 汇率政策的国际连动性

一国汇率的改变会对他国汇率产生连动效应,尤其是与货币变动国经贸往来密切及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对汇率的变动最为敏感。举例来说,在同为出口竞争的国家,在他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必然也要让本国货币随之贬值,以维持价格竞争力。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货币的连动性”,而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各国都很难避免和国际强势货币(如美元或日元)产生连动性。

2001年日元大幅贬值所形成的国际连锁效应便是最好的例子。2001年,在日本政府政策干预下,日元走势开始疲软,受此冲击,与日本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货币纷纷对美元急跌,如韩元刷新29个月新低,以1美元兑换1327韩元报收,新加坡元触及38个月的新低,收在1.803兑换1美元,泰铢则刷新三年来的新低,为1美元兑44.98泰铢。在经济冲击方面,一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的经常账户开始恶化,其国内企业面对更激烈的国际竞争,许多企业更因此宣告倒闭,例如泰国有十家日资汽车组装厂和二十四家日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宣布倒闭,日本在新加坡的爱华电子公司也宣布裁员以减少成本支出。

综上所述,不论是1985年美国联合国际力量使日元升值,还是2001年日本政府干预使日元贬值,其出发点都认为,汇率政策的经济效应最为迅速,且对国内政经体制的稳定性影响最小,但由于汇率政策自身的特性,会对他国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如1985年后日元大幅升值所造成日本的泡沫经济,日本至今都还在收拾泡沫经济所遗留下来的坏账;2001年日元大幅贬值,使亚洲周边国家的汇率竞相贬值,差点重蹈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覆辙。说明美国和日本的政治行动者在制定政策时,考虑的仅是本国利益而非国际共同利益。

四、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思考

我国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时所面对的外部压力,与1985年美国干预日元汇率时的日本很相似。2005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4270亿美元,国债总量超过8万亿美元,约占年GDP的80%,累计贸易赤字达8050亿美元,从2004年占GDP的5.7%上升至2005年的6.4%。美国政府的赤字和国债要不要去填平?这是不用回答的当然问题。美国的“赤字”和“国债”之剑,终有一天会变成无法驾驭而刺向自己及他人的灾难。美国政府寻求与各国的贸易差平衡,就是其最常用、最主要的扭转策略措施之一;美国在1984年要求日元升值,就是寻求“填平”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今又打起人民币升值、故伎重演的主意。

以美国议员舒默和葛兰姆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严重低估,从而使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享有不公平的优势,这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失业,并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2005年创下约2016亿美元的记录(按美国商务部统计口径)。他们所提出的法案威胁,除非中国同意允许人民币升值,否则将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征收高达

27.5%的关税。

美国官方和金融界希望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为10%以上,而美国国会政客们的意愿则是25%,他们更高、更美满的期望是35%或45%,这样就可以像1985年要挟日元升值那样,向美国第一贸易伙伴——中国转移他们的“双赤字”。然而,1985年日元升值超过100%也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今人民币升值同样无法解决美国的双赤字。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率与其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相关,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他们需要大量的进口产品,而中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已不具备比较优势,人民币升值,美国要么从其他国家进口,要么继续从中国进口,因为价格肯定更昂贵,所以贸易赤字只会增加。

前文已指出,一国应根据其产业竞争力,来决定其币值高估还是低估,汇率的调整必须由市场自由供需决定,而不能完全取决于政治性因素。汇率政策的使用必须有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配合,而最优汇率政策的实现,应该是遵循市场机制而非政治力量,政治干预或国际压力下的汇率政策很难实现其经济目标。正如香港大学肖耿教授所指出,两位美国议员代表的只是美国一部分利益集团的极端观点,但他们可以利用美国公众和政治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理解和恐惧心理大做文章,不惜牺牲美中双方的共同利益。林毅夫教授则指出,既然外汇管理体制没有问题,汇率水平也合理,中国就不能做政治压力的替罪羊。

那么在外围压力下我国应如何实现最优的汇率制度?

首先,我们要思考美国会如何解决8000多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和8万多亿美元的国债。从美国的政经体制和一贯的汇率干预作风来看,其策略只能是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对长期“超前消费”,没有储蓄(据美国商务部报告,2005年美国人储蓄率为-0.5%,收入增长了0.4%,消费却增加了0.9%)的2.9亿美国人没有任何利益损害,对天量“国债”有百利而无一弊。现在贬值平衡了以前已经花出去的钱,既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又无损美国国家利益。因此,美元贬值是美国自我保护的大势所趋,基于此,全球应对美元贬值在所难免。

其次,人民币需要历史性地与国际接轨。随着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也需要历史性升值,但绝不是“要挟”和“捆绑”下的灾难性升值。人民币升值首先要符合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才是与国际接轨的承诺、义务和代价。若为美国的赤字和国债而升值,甚至导致中国经济的衰退,那么受影响的将是美国自身,世界经济也会受波及。这就要求人民币汇制的建立不仅要考虑到美元,还要顾及欧元、日元和卢布等30种~50种它国货币。中国需要且必须付出这样的大国考虑和智慧,才能在未来实现真正的和平崛起。

最后,象欧元那样“独立自主”,是人民币摆脱美元长期纠缠、要挟唯一的可行之路。近三十年的中国高速经济发展中,选择了与美元捆在一起的战车上。即使在2005年7月,我国放弃“单一钉死美元”的汇率制度,从而实现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其中美元的比重仍然很高。很多学者指出,“一篮子货币”包括国际主要国家的20种货币,而能进入汇率数值、能体现1%变化的它国货币不超过10家。而德国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则更具体地指出:这“一篮子货币”中,美元比重占94%,其它货币的比重为6%。而在这6%中,就有欧元、日元、韩元、英镑和澳大利亚元等。因此,美元之外其他国家货币的比重实在是太有限,离“合理”的汇率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随着中国与主要国家贸易往来的增加,这“一篮子货币”要真正起作用,美国以外其他国家货币所占比重至少应该在20%以上,否则“一篮子货币”就需要调整。(下转第35页)

一定要把握准确,因为规划一旦实施,就将对整个科技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能承受的变动只是一些技术手段和具体实施步骤的局部调整。面对诸多金融新产品的开发要求和电子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任务,需要系统地理顺、有计划地推进。面临新世纪的到来,在一个中短期阶段内全国金融科技工作如何开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事。

2.建立一个以统一会计核算为基础、以客户为中心的计算机应用体系。所谓以客户为中心,就是银行将来的计算机应用系统将以客户信息为中心,而不是围绕着现在的会计账户、储蓄账户、信用卡账户来考虑。为了与国际接轨和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实名制推出是势在必行,因此要求建立并完善以客户为中心的计算机应用体系,以尽快适应今后的这种变化。

3.建设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通过建立数据仓库,运用数据挖掘、OLAP等技术手段,利用柜面系统产生的大量数据对银行的经营状况做全面分析,对银行业务的经营与管理进行预测,在建立起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上,运用先进、完善的数学模型,构造银行的决策支持系统。

4.进一步加强网络建设。金融计算机网络是将银行各部门及其信息系统有机结合的桥梁,也是银行业务发展的立足之本。银行应根据网络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并结合自身的需求,合理选用统一网络平台,整合分散、孤立的网络系统,大力加强网络基础建设工作,同时应加强网络管理以及网络安全控管工作。

5.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高银行服务质量,增强服务手段。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传统银行业务提出了挑战,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人们的生活、工作等方式在不断地变化,要求现代银行采取适应这种变化的营销方式。金融机构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顺应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将新技术融入到银行的产品、渗透到银行的服务之中。

6.进一步完善金融电子化标准与管理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金融电子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在标准、规程和制度的约束下科学、规范地进行,才可能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在积极应用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人民银行制定的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不同银行实际情况,制定金融电子化的标准和管理制度。

7.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各尽所能。现代银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今后,外资银行会凭借优厚的条件,从国内银行吸纳人才,这无疑会给国内银行造成沉重的打击。从现在开

始必须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银行所需科技人员。如何建立有效的科技人员激励机制,各尽其能,合理培养和使用人才,是需要我们认真思索的问题。

“银行服务趋于无限,银行本身趋于无形”,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银行服务可以通过电话、Internet、网络电视、互动电视、可视电话等多种方式提供,必将打破时空的限制,而固定的营业网点由于成本的限制逐渐趋向萎缩。科技不仅为银行带来了服务手段的更新和金融产品的涌现,还将从深层次影响银行的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将带来银行全面的企业重构。无论从银行科技工作本身面临的压力,还是银行持续发展的需要,都要坚持不懈地总结金融电子化发展经验,吸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思想,不断加强科技工作,为提高银行的竞争力起到应有的作用。

五、结束语

金融科技在历经了从模拟手工到融入业务的进程之后,现在已经成为推动金融改革的内在动力。金融科技的发展过程使人们认识到,简单依靠科技进步的成果来改革传统的金融业务犹如用一把双刃剑来解决金融业的问题:它在提高效率、降低风险的同时也会带给金融业更大的风险。如何利用科技进步的成果来限制和减少风险,已成为现代金融业不断探索的课题。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限制和减少风险的关键是,怎样借助合理的业务管理模式获得可靠的信息源,如何从全局的角度来观察、预测风险的诱因,如何依托信贷资产的质量分析和支付系统提供的资金流分析来调控金融风险。毫无疑问,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发展和壮大金融科技。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 [3] 陈耀先.中国金融分析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 [4] 吴念鲁.论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J].金融与保险,1998(11):87-88.
- [5] 林毅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N].经济学消息报,1999-07-09.
- [6] 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繁荣与萧条(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7] 汪小亚.大突破——世纪门槛的中国金融改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 [8] 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X 校对: T)

(上接第3页)果拴死在美元上,就必然面临着一场无法绕过的灾难,就如同美国最大的政治和经济盟友日本在90年代所经历的长期经济衰退一样。

在“一篮子货币”中,如果美元所占比重不是94%,而是80%、70%或50%,甚至象富裕的欧洲那样不占任何比重,那么人民币还能成为第一超级富国美国的“替罪羊”吗?将于2006年6月正式推出的亚洲货币单位(亚元),与欧元一样有改变世界贸易格局的重要意义,其中人民币的“贸易额、购买力均价、货币权重”三项占到亚洲货币单位总份额的34.79%,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借助全球国际金融市场为人民币合理定价,从而摆脱钉死美元、被美元要挟的历史困境。亚元的推出必将为我国的

汇制改革带来一次绝无仅有的历史机遇。

【参考文献】

- [1] Peter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 葛开明.人民币汇率与劳动生产力相对成本优势的思考[J].世界经济研究,2005(1).
- [3] 李天德,马德功.人民币汇率机制新解:政府行为与非对称性[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2).
- [4] 马建堂,杨正位.日本经济:全面衰退、积重难返、教训深刻[J].世界经济,2002(1).
- [5] 张新茂.透视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玄机[J].现代国际关系,2005(6).

(责任编辑: X 校对: Q)